

三阶教信仰与 淳化金川湾石窟艺术

□ 白文

关中淳化金川湾著名的三阶教刻经石窟,开凿于高宗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之间(662-670年),窟内所刻的八经有四部属三阶教主信行的作品。三阶教崇尚地藏,但淳化金川湾刻经石窟中却没有地藏形象。本文以刻经石窟中的《大方广十轮经》刻经为线索,对金川湾刻经石窟与地藏的关系以及金川湾刻经石窟的功能、性质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三阶教的创立和信仰的流行

三阶教是信行禅师(540-594年)所开创的一个佛教宗派。三阶教的教义认为众生依照其所生的时代而决定他们的根机,时值公元6世纪时属于佛灭度后一千年以后的末法时期,为一浊恶的时代,众生的根机属于最下劣的第三阶,众生应修习和其根机相应的当根佛法,也就是“普法”。这个“普”字,是相对于“别”字而言,即不能偏依特定的佛经修习,只能修习“普佛普敬”,普敬诸佛,共有七阶佛名的下根佛法^[1]。普法的意义在于普行,即普施组织的“无尽藏行”^[2]。而无尽藏的意义,如《像法决疑经》强调集体布施的功德说:

“若复有人,多饶财物,独行布施,从生至老不如复有众多人,不问贫富贵贱若道若俗,共相劝化,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3]

就是说每个人的一善一行必须融化于“无尽藏行”,才能获得更大的福德。信行建立的无尽藏,可能是受了《华严》饶益众生思想的启发,并认为到了末法时代,应有一种能够满足时代要求的佛法,即所谓三阶佛法。三阶的名称,是依时、处、人三项而建立。约时三阶,即佛灭后的正、像、

末三个时代而言,以佛灭后五百年正法时代为第一阶,次五百年像法时代为第二阶,佛灭千年以后末法时代为第三阶。约处三阶,以净土为第一阶一乘(大乘)之处,秽土为第二阶三乘(小乘)之处,第三阶为戒见俱破的众生之处。约人三阶,即一乘、三乘和世间根机的区别,分为三阶。即信行认为众生根性不同,必须因人说法。既然时属末法,处在秽土,人乃劣机的世间,则应信修普法。信行强调普法是末法时代众生唯一得救的法门;因此,当时有许多人从他化导,奉以师礼。

三阶教的起源和北齐邺都一地的僧人可能有密切的关系。常盘大定提出了安阳宝山寺(隋文帝时改称“灵泉寺”)是“三阶教的发源地”之说。如宝山寺大住圣窟的开创者灵裕,长信行22岁,两人都曾受业于邺都僧人道凭,道凭属于《十地论》“地论学派”中相州南道派。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年),道凭在安阳灵泉寺开凿大留圣窟;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灵裕在灵泉寺开创大住圣窟。大住圣窟的刻经所显示的就是灵裕的思想,其中窟内右方所刻的《大集经月藏分中》五百年文、窟外壁刻《大集经月藏分中》法尽灭品、佛名等,都和三阶教所宣扬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4]。

信行禅师是相州魏郡人(河南安阳),早年在相州一带活动,寻求和自己理念相同的人,而逐渐发展出三阶教派。信行及其徒众的修行和学说,后来传到了朝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信行和弟子僧邕等人应召入京,住在左仆射高颍舍宅为寺的真寂寺。这一段期间,是三阶教在长安发展的时期,信行和其弟子散居在京师的五所寺院作为传教的场所。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信行圆寂,弟子僧邕接替信行继续传播三阶

教。然而,三阶教由于其教义特殊,信仰、修行方式不合适时,先后在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圣历二年(699年)、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朝廷敕令全面禁止三阶教,或予以此教派僧人若干的限制。不过,其教并未因此而衰微,唐朝僧人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别录中·伪妄乱真录》中三阶法及杂录后注云:

“开皇二十年有敕,禁断不听传行。而其徒既众,蔓延弥广,同习相党,朋援繁多。

隋文虽断流行,不能杜其根本。”^[5]

虽然隋文帝全面“禁断不听传行”,但没有完全禁绝。唐代武则天和玄宗两朝禁止三阶教教典的流通,似乎也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从诸多资料中可显示玄宗、代宗、德宗时代,三阶教在长安还是相当流行的^[6]。三阶教的经典以类聚经为主,其主要典籍《三阶集录》或《三阶佛法》,可以说是《大般涅槃经》、《十轮经》、《大方等大集经》等经文的丛钞。唐代诸经录所著录的三阶教典籍,早已全部失传。只有窥基《西方要决》,怀感《释净土群疑论》,智俨《华严孔目章》、《华严五十要问答》,贤首《华严五教章》,善道《念佛镜》等。敦煌发现的三阶教典籍残卷,有《信行遗文》、《三阶佛法》4卷、《三阶佛法密记》卷上、《对根起行法》、《无尽藏法略说》、《大乘法界无尽藏法释》、《七阶佛名》等。三阶教主张念地藏菩萨名号,其核心典籍《三阶佛法》中大量引用地藏信仰的《大方广十轮经》,从而构成了三阶教与地藏菩萨信仰较密切的关系。如《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是唐代三阶教的学僧师利所撰成,此经第二品《地藏菩萨叹法身观行品》,就是专门叙述地藏菩萨所颂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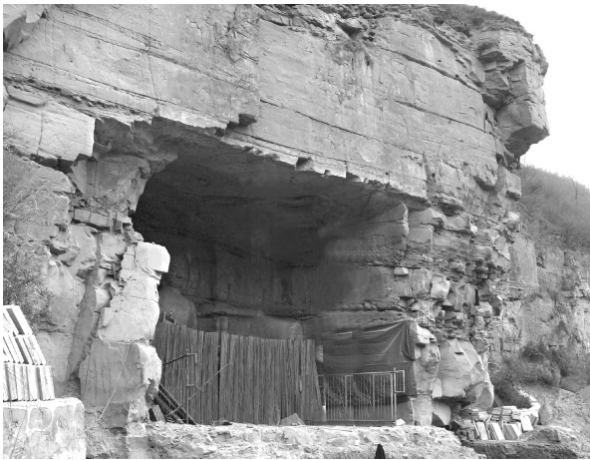
三阶教信仰强调忍辱苦行与布施:每天仅乞食一顿。见人不论男女,一概礼拜。提倡布施:即死后置尸体于森林,供鸟兽食,也叫做以身布施。反对净土宗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7]。并认为其它一切佛像是泥龕,不须尊敬,一切众生才是真佛,所以要尊敬。三阶教主张归依的佛有五种。即真身佛、应身佛、形象佛、邪魔佛(外道诸神、佛菩萨应化身)、普真普正佛。而普真普正佛又有四种,即如来藏佛、佛

性佛、当来佛、佛想佛。此所谓普法四佛,从三阶教义来说,一切迷于现实的众生,本有可以成佛的可能性。即从如来藏或佛性来看都是佛,因此一切众生即为“如来藏佛”或“佛性佛”,其可能性开发成为实现时便成为佛。故一切众生都是“当来佛”,对一切众生皆作佛想,故一切众生都是“佛想佛”。由于世界众生无不为佛,故四佛实际是一佛。这就是普佛思想。普佛思想将普敬众生与普敬佛统一了起来,构成了普法思想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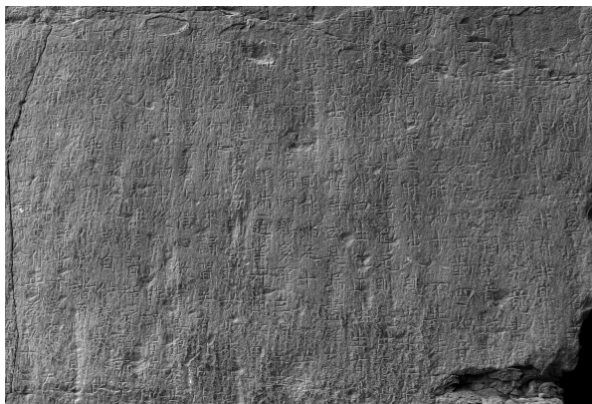
尽管三阶教崇尚地藏信仰,但又反对礼拜佛菩萨,认为造像形式的佛菩萨是泥像,不值尊重,而众生才是具佛性之真佛。在普敬众生之时,又同时说认恶,即末法众生具有空见邪见。所以一面教以普敬他人,一面劝其自己认恶。如唐临的《冥报记》说:“信行又据经律,录出《三阶佛法》四卷。其大旨劝人普敬认恶,本观佛性,当病授药。”但这些宗旨与当时佛教界一般看法很不相同,独出一格,因而不容于当时佛教界与世俗界,这些都是不断受到打压直至衰亡的一个原因^[8]。

二、淳化三阶教刻经石窟

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历来未受注重,也不见于金石著录。清康熙与乾隆版《淳化县志》中把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称为石佛堂。金川湾刻经石窟位于西安西北方向约百公里处,东与三原、耀县接界,西至泾河,与永寿、礼泉和彬县相邻。这里是关中平原与渭北黄土高原丘陵地带交错之处。这所三阶教刻经石窟就位于金川湾村西冶



图一 金川湾石窟外景



图二 金川湾石窟东壁刻经

峪南岸的石崖上(图一)。刻经石窟仅一洞室,窟口向北,平面略为方形,平顶,进深与宽均达10米,高为7.5米,其内正壁雕造一躯大佛坐像,头光有七佛,高近5米。两侧壁刻满佛经,上部残泐严重,下部尚好,原刻16万字,现存约近6万字,均属三阶教刻经(图二)。由刻经内容可知,这应该是由三阶教徒所刻造的石窟。刻经分布于东西两个侧壁,共有八部佛经刻出,其中有四部可以明确是三阶教专属的典籍,另有几部也是三阶教最为尊奉与经常念诵的佛经。其刻造的方式为由下至上,层层递进。每层则是由右至左竖行刻下。由东西两壁来看,自然是东壁为起首、西壁为结尾。东壁起首先刻三经,均是信行禅师所撰:

1.《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信行禅师撰。

2.《明诸大乘修多罗中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一卷,信行禅师撰。

3.《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一卷,信行禅师撰。

4.东壁上面还刻有八卷本《大方广十轮经》。每层有一卷,共刻了11层,将高达7米有余的壁面占满。

西壁所刻亦为四经,但分量有所不同。第一层就刻出了三个经,依北端起为:

5.《七阶佛名经》。

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7.《如来示教胜军王经》。

8.西壁上层刻有《添品妙法莲花经》全文,亦每卷一层,七卷经文刻满直达窟顶,连同底下一层共有八层经文。全窟没有题记。西壁第四层

刻经后面曾存有一块线刻出的碑形,但无任何文字在内。估计为原先设定题记之处,但没有付诸文字。庆幸的是西壁《金刚经》等下存有两行施主题记。是任“左戎卫兵曹参军”的某官员书写布施。由于此官职仅在唐高宗的龙朔至咸亨年间颁行八年,所以此窟的年代约可断定在从公元662至670年之间。

要了解开凿金川湾刻经石窟石窟真实用意,探明窟内刻经的基本思想非常重要。信行所撰《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与《明诸大乘修多罗中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异同法》,重点似均落在“发菩提心”上,但其仍侧重三阶佛法内涵。前者重在对具深浅不同根机者施教发心,后者实际上主要讲世间具十种恶之人发菩提心之法。《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名曰抄经。实则依信行拟出之提纲而抄,全纳入信行思想之系统内。此经对原典中末法事件则近于全抄,可见其重视末法说之基础。《七阶佛名经》,作为礼佛忏悔的仪式。根据敦煌文书发现的几个《七阶佛名》写本,或称为《礼佛忏悔文》,或称《昼夜六时发愿法》,内容次序虽有不同,但都有三阶教徒持诵的课本。《七阶佛名》的礼诵次序是:敬礼常住三宝、叹佛功德、普光佛等五十三佛、释迦佛等三十五佛、宝集佛等廿五佛、忏悔文、梵呗文、说偈文、三归依文、无常偈等。这一系列宗教仪轨,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寺院中“打普佛”的母本。

信行以上的这些撰述,旨在强调所谓三阶普法,树立对佛教的信心。即在佛灭后一千年的末法时期,于法不分大小,于人不辨圣凡;也就是说,世界众生无不为佛,一切众生都是如来藏佛,对一切已成未成诸佛,应该加以尊敬,因为末法众生具有空有邪见,所以应该劝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因此三阶教非常重视忏悔。所以,普礼诸佛与忏悔认恶便联系起来。

三、金川湾刻经石窟和地藏的关系

一种外来信仰的兴起,真正出现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除了相应的时代条件外,相关经典的传播与普及是非常重要的事。就地藏信仰的兴起而言,虽然早期佛经中已经提出、但在中国真正演变成一种时代观念或危机意识的末法思想为

其准备了时代的条件,这在经典的传播力度方面,宣扬末法思想的三阶教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金川湾刻石窟的东西两侧壁上的八部经典中,其中的东壁的八卷本《大方广十轮经》引人注目。我们知道,《大方广十轮经》是地藏三经之一,早在北凉就已译出。此经体现出的末法思想对后来地藏信仰的流行起着重大影响。如经中体现出末法时代的忧患意识,对僧团内部谤正法、贪名利、愚痴无明加以批判扼制,又强调维护僧众尊严,以使正法不灭,同时对身处五浊恶世的众生于正信难发而给予增信。经中还指出,礼拜供养地藏的功德超过弥勒、文殊、观音、普贤等很多倍。特别是信行根据《大方广十轮经》指出,在佛灭度后的五浊诸恶世界,所信仰的诸佛菩萨应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摩訶萨为上首。《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中列有三阶教教主信行撰集的三十五部典籍,其中有两部直接就出自《大方广十轮经》。根据矢吹庆辉的统计,三阶教核心经典《三阶佛法》四卷中所引用的《大方广十轮经》多达到一百二十次;《对根起行法》一卷引用《大方广十轮经》也达到八次。而且这些引用大多关乎三阶教立教之根本,比如立教开宗的宣言、第一大段

有空有见众生的多少分齐、第二大段佛灭度后的时节分齐、六阶根机、行法行王、二十四段普真普正佛法、十七异名等等,都引用了《大方广十轮经》。不仅如此,《大方广十轮经》中的一些关键词语如“邪见成就众生”、“颠倒众生”、“彼非我弟子,我亦非彼师”、“九十五种异学外道”、“以驴唯狗驴”、“一切诸佛不能救”、“作五逆四重诽谤正法毁谤贤圣”、“旃陀罗”、“堕阿鼻地狱”等等说法都是三阶教典籍中的惯用语。甚至三阶教的普法教义——佛想佛(普佛)、拥护破戒(普敬)、三乘共尊(普法),都是根据《大方广十轮经》而来的^[9]。唐永徽二年(651年)玄奘重译《大方广十轮经》,使得地藏菩萨的各种功德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熟知,这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对地藏菩萨产生一定程度的信仰。经中倡导的末法思想,在其他宗派的高僧如窥基、道宣、法藏等的著作中有多处被引用和阐释^[10],足见当时对此经的重视。

三阶教正是通过对《大方广十轮经》的传播,不仅自身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地藏信仰在中土获得一定程度的普及。值得关注的是,唐初时,称念地藏名号和雕刻地藏形象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信仰行为。如法琳《辩正论》卷七引述儒生的诘难云:



图三 信行碑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图四 东门柱东壁双身地藏像

“造像书经 本期现福 持斋行道 贵益眼前。何为念地藏而无征 唤观音而不救？”^[11]

可见当时人已将称念观音、地藏相提并论。如西安碑林藏三阶教信行残碑上的地藏像(图三);以及彬县大佛寺石窟千佛洞的地藏单体、组合造像的雕刻等蔚然成风(图四)^[12]。说明了当此末法时期,人们供奉地藏菩萨,刻镂地藏形像,其目的在于欲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报。也就是说,凡在五浊恶世、有苦恼众生之处,无不有地藏菩萨的化身。可以说,地藏信仰在唐代的盛行得益于的《大方广十轮经》的传播,而其间的始作俑者当属三阶教之功。

四、金川湾刻经石窟的性质

三阶教在信仰实践和主要修行中,修禅和头陀行都是重要的成分。很多三阶教的僧人称为“禅师”。而且,认恶推善、乞食头陀、道场观佛都是三阶教的教义与实践的内容^[13]。三阶教提倡“观像”,如信行的《七阶佛名经》,也称《昼夜六时发愿法》中云:

“六时礼拜佛法大纲,昼三夜三各严香花,入塔观像,供养行道。……观此七阶佛如在目前,思惟如来所有功德,应作如是清净忏悔。”^[14]

不同根机的人观行是不同的,信行所著《制法》有云:

“又佛灭度后凡夫、恶时恶世界众生,根机不同,或上或次或最下下。根既差别,观行亦异。上根者,得在静室端坐,闭目用心,作无相三昧观。……用心观佛过去真身。……次根者,亦得在静室端坐,闭目用心,观现在形像佛从少至多。……最下下根者,得行,唯得立,唯得举头开目,用眼观现在形像佛,不得低头,不得闭目。”

可见三阶教的“观像”,最上者乃闭目用心,观过去佛之真身,而举头开目,用眼观现在形像佛,只是最下下根机者的观法。所谓“观此七阶佛如在目前”正是指用心观而不是用眼观。而且信行在《制法》中交待得很清楚:具备修行佛道能力的人,须端坐于静室进行无相三昧观。三昧是心定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又扩而指精神集中法,即专思默想的禅定功夫,控制意志使心思集中于一境,以获得误解、功德、神通的思维修习

方法。因此,金川湾刻经石窟很可能是三阶教信徒专思默想的禅定功夫的场所。

既然是在静室进行的禅定功夫,自然也包括头陀行。头陀,梵语 dhu'ta,意为修治身心、舍弃贪欲,也称作“头陀行”,主要是指去除衣服、饮食、住处三方面贪欲,也有称“十二头陀行”,它包括:在阿兰若处住、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受一食法、节量食、过午不得饮浆、着弊纳衣、但三衣、在冢间住、在树下坐、在露地坐、但坐不卧。因此,中国古时一些修习头陀行的僧人们,在山林郊野找寻天然石穴或自行开凿石室或石窟进行坐禅修行。如唐初僧人道会对那一个时代头陀僧人的行径,有很简洁而具体的描述:

“况五众名僧、四禅教首,头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纳。”^[15]

头陀行者或依林壑、或栖崖窟、或结庵而居,其中有的僧人更在其所住的崖窟、草庵内过世;有的很快就被发现,有的则是经过一段时日才为人所发现。石室本是僧人坐禅习静的场所,由于有些僧人终生在此修行,就死在此地,因此,从晋代开始,石室也成为佛教僧人藏尸之所。一直到唐末,此一风气仍然不衰。如会昌三年(843年)能禅师在山中石室的铭文中云:

“自有此山,即有此窟,火不能焚,水不能没。能师砢砢,劳心若骨,誓口山僧,凿成禅室。室成糟首,焚香白佛,愿此石室,不粤不室,兴僧安禅,与劫终毕。猛兽勿入,毒虫应出。不葬死僧,不栖鬼物。口违是铭,得罪如律。”^[16]

能禅师在山中开辟了一石室,作为修禅之所,唯恐为其它僧人侵占作为藏尸之所,特别树铭立石,说明此石室是“不葬死僧”的。由此似可推测当时若有一个石室禅窟,是有被人侵占作为瘞窟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僧人行头陀在石室进行修禅直至坐化早在晋代就有记载,并非信奉三阶教信仰的专属;由于这种修禅的石室是可重复地供其它的僧人使用,有些僧人便终生在此修行,就死在此地,因此,从晋代开始,石室也成为佛教僧人藏尸之所,也称之为石室瘞窟^[17]。三阶教的头陀行僧人只是沿袭了这种修行,并就地坐化方式。

石窟瘞葬是露尸葬的一种变化形式。中国古

代露尸葬源自于印度^[18]。印度的露尸葬包括林葬和水葬,其中林葬也称野藏或是露尸葬^[19],在印度露尸葬被视为是提升苦行境界的一种修行方法,认为弃尸在尸陀林中^[20],可获得福报,具有功德。可以说,石窟瘞葬是在中国的外来僧人或本土僧人对林葬直接曝尸林野的一种调和方式。因为露尸葬与中国儒家传统伦理中“孝道”思想相悖,所以在作为僧人葬法传入中国后的很长时期内发展比较缓慢,并最终被火葬法所替代。瘞窟既然作为在中国产生的佛教葬法,并主要存在于中古时期;到了隋唐时期,三阶教信仰融入并沿袭了这种葬法,终生在石室或刻经石窟进行修禅并就地坐化。

(本文为西安美术学院 2010 年度科研项目)

[1] 条原勇慈《三阶教的普行について》,《印度佛教学研究》,第 107 页,第三十九卷第二号。

[2] 无尽藏,原指贮藏无限财宝之藏,转指广大无穷之功德。法藏《探玄记》卷十九,谓出生业用无穷竭,故名无尽藏。慧远《大乘义章》卷十四亦云:“德广难穷名为无尽,无尽之德包含曰藏”。《大正藏》,第 44 册,第 742 页。无尽藏,系古代佛教寺院所设置之金融机构的名称。或称无尽、寺库、质库、长生库、解典库、解库。‘无尽’原意谓德极广;‘藏’,指包含无尽之德者。其后,此词被引申借用,印度称寺院之财为无尽财,中国称寺院所设之金融机构为无尽藏。寺院设置无尽藏之制,始于南北朝,而盛行于唐代。设置的目的,原在社会救济。即以信众喜舍之财为基金,于发生饥饉时,借给贫民,借贷时不须立字据,利息极低,且以不定期限方式归还。但至宋代所谓的长生库、元朝的解典库时,则变成一种主办放款业务的营利事业,全然成为寺院经济来源之一。无尽藏的设置,由于利息低,又可不定期归还,故甚受大众欢迎,相当盛行。一般寺院多设有此种机构,其中以唐代长安三阶教化度寺的无尽藏院最为有名。化度寺的无尽藏院,系三阶教僧信义于武德(618—626)年间所设,其目的在救济饥荒时的贫民、修复伽蓝及供养三宝。如《两京新记》中记载在长安的“化度寺,寺内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京城施舍,后渐崇盛。”

[3] 《大正藏》,第 85 册,第 133 页。

[4] 常盘大定《三阶教の母胎としての寶山寺》,《宗教研究》新第四卷,第 38 页,1927 年。

[5] 《大正藏》第 55 册,第 679 页。

[6] 如唐代净土宗的《西方要诀释疑通规》中提到“准今修行,学普为宗”之句。《大正藏》,第 47 册,第 108 页。可见唐代三阶教曾有一度是相当流行的宗派。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玄宗开元十三年乙丑岁六月三日的一道敕令:“敕诸寺二阶院并令除去隔障,使与大院相通,众僧错居,不得别住。”《大正藏》第 55 册,第 679 页。可见当时在长安有许多寺院里另设有三阶院,与寺中其它殿堂隔开来,在寺院中隐然形成一种特殊的势力;由此亦可推知三阶教在长安的势力是相当庞大的。

[7] 如信行遗文《三阶佛法》中有言:“若为五浊诸恶世界,佛灭度后,空见有见众生,最大恶世界,恶时恶众生,起教即苦、无常、无我、不净。诸佛菩萨、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摩訶萨为上首,等合学之。”可见,在三阶教的“普法”教义中,需要“普敬”诸佛菩萨,同时指出了末法时期亦强调地藏菩萨为“上首”。

[8] 三阶教的学说与行持,同当时佛教各宗派极不协调,屡遭攻击和非难。如《开元释教录》认为信行的撰述是“乖反圣旨,复冒真宗”。所以,故自隋开皇十四年(594)信行去世至唐开元十三年(725)前后百余年间,曾遭到四次打击。1.隋开皇二十年,被禁断传行,但未禁绝;2.武周证圣元年(695),三阶教典籍被认为违背佛意,命尽数送礼部集中,作伪经符篆处理;3.武周圣历二年(699),限制三阶教徒,除乞食、长斋、持戒、坐禅而外,其它行为都属违法;4.唐开元十三年,命诸寺三阶院除去隔障,和大院相通,使三阶教僧与一般僧侣同居,不得别住。所有三阶教典籍,全部除毁。

[9] 矢吹庆辉《三阶教の研究》,第 645 页。

[10] 尹富将盛唐以前有关阐释、引用新译本《十轮经》的情况约略整理制表,可供参考,见《中国地藏信仰研究》,第 67~68 页,巴蜀书社 2009 年 10 月。

[11] 《辩正论》卷五,《大正藏》,第 52 册,第 537 页。

[12] 参照白文《关中唐代地藏菩萨造像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 40 卷第 4 期,2010 年 7 月。

[13] 《三阶教资料杂考》,《支那佛教史学》,第 71 页,第一卷第一号。

[14] 敦煌写本北 8422(重 22)号,见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第 110 册,272 页。中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1981 年。

[15] 《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护法下,《释道会传》,第 642 页。

[16]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第 34~35 页,《能禅师石室铭》。

[17] 瘞窟大约产生于 3 世纪,刚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瘞葬目的,而是僧人坐化于修禅石室,石室便成为其葬

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壁画内容浅探

□ 王时敏 李国华

朔州,雁门关外古州治,燕云十六州之一。崇福寺,鄯阳古刹,曾名林衙寺,金天德二年(1150年)赐额“崇福禅寺”。现院落五进,自山门向北,依次为一进金刚殿,二进钟楼、鼓楼、千佛阁,三进文殊殿、地藏殿、大雄殿,四进弥陀殿以及五进观音殿。寺内弥陀殿、观音殿为金建,山门为清建,其余为明建。弥陀殿为寺内主殿,建于金皇统三年(1143年),由开国侯翟昭度负责施工,殿宇正檐下悬挂的“弥陀殿”竖匾,为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原物,崇福寺是全国辽金三大佛寺之一。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先是在形式上依附于中国传统宗教中的神仙道术,受到固有文化主体儒学的抗拒与排斥,后经魏晋南北朝,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影响遍及全国。开始形成派别,直至隋唐才逐渐走上了与儒学相融合的道路,寺院经济雄厚起来,势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建立了宗派、完成了体

系,并开始以中国佛教的面貌走向世界。同时佛教艺术也获得迅速发展,寺院、石窟相继沿丝绸之路向内地延伸,本土道教也随之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图像体系,南北朝时期寺观已遍布各地。隋唐在统一的局面下,南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融合,与边远地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以及域外(印度、波斯等)文化进一步的交流,孕育了更为灿烂的艺术成就。寺观壁画在这样的前提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宏伟的构图与样式,塑造了丰富感人的形象与境界。唐代的一些典范作品,也成为后代传摹的祖本,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壁画,就是一组承袭晚唐画风的佳作。

二

崇福寺弥陀殿是供奉阿弥陀佛的大殿,面宽七间,进深八椽,规模宏伟。殿内佛坛上塑巨像三尊,中间为弥陀佛,盘曲坐于高大的佛坛之上。两侧塑左胁侍观音菩萨和右胁侍大势至菩萨,佛学上称之为“西方三圣”。阿弥陀佛,汉译又称无量

所。如《高僧传》《诃罗竭传》的记载:“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乃西入,止蒞至山石室中坐禅……至元康八年(298)端坐从化,弟子依西国法阇维之,焚燎累日,而尸犹坐火中,永不灰烬,乃移还石室内。后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晋咸和中往其国,亲自观视,尸俨然平坐,已三十余年。”《高僧传》,卷十,神异下,《晋洛阳至山诃罗竭传》,第370页。

[18]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叙述印度的殡葬法有火葬、水葬和野葬:“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见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08页,中华书局,1990年。

[19] 野葬也就是林葬。道宣的《续高僧传》中则说印度有四种葬法,在上述的三种之外,另有土葬。这些葬法都属于露尸葬;也就是说,印度的露尸葬中并不见石室瘞葬。

[20] 尸陀林,梵名 s'tavana。又称作尸陀林、寒林、尸多婆那林、深摩舍那林。位于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北方之森林。林中幽邃且寒,初为该城人民弃尸之所,后为罪人之居地。其后泛称弃置死尸之所为寒林。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副教授)